

一九九零年硕士学位论文

江南地区史前木器初探

谢仲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990年5月

1990年硕士学位毕业论文

江南地区史前木器初探

系别：考古系

专业：石器时代考古

年级：1987级

作者：谢仲礼

导师：安志敏研究员

内 容 提 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系统整理目前江南地区史前遗址所出土的木器；二是以此为基础，探讨木器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其它问题。

由于江南地区长期以来一直以湿热的气候为主，这不仅为史前时期的先民制造木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同时也为史前木器的保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经过全面的考察，本文将史前木器分为八大类：农业工具、器柄、狩猎武器、加工工具、水上交通工具、纺织工具、日常生活用具以及其它用途尚不明确的器物。

虽然到目前为止，对木器所用原料所作的科学鉴定极少，但我们仍能对木器制作者的选料原则有一定的了解。大凡受力较大的工具类，多选用质地较坚硬的木材，而不必受太大力的日常生活用具等，则多选用易于加工的较软的木材。

本文经过一番考察后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木器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器类的多样化，二是用途的专门化，三是器形的复杂化。由于资源丰富，而且易于加工，木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使用，在人类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木器的使用，而且还被用作人类追求美的辅助工具，用作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史前时期，木器是人类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它的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石器和陶器，因为它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使用要比它们更为广泛。

本文正文 24,000 字，加上图和注共约 32,000 字。

丁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二
日

目 录

一、 绪言 ······	1
二、 江南地区史前时期自然环境概述 ······	2
三、 史前木器的分类 ······	3
(一) 农业工具	
(二) 钻柄	
(三) 制造工具	
(四) 加工工具	
(五) 林上交通工具	
(六) 编织工具	
(七) 日常生活用具	
(八) 其它	
四、 其它地区的木器 ······	11
(一) 台湾地区	
(二) 华北地区	
五、 有关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几个问题 ······	12
1. 史前木器的起源和发展	
2. 木器在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中的地位	
3. 木器的选材和加工技术	
4. 木器	
5. 钻柄	
6. 木形器	
六、 结语 ······	20
注释 ······	21

江南地区史前木器初探

一、绪 言

人类一经出现，他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与自然界的其它部分——空气、山川、土壤、动物、植物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植物资源，不仅包括食物——根茎、果实，而且还包括制造木器的原料——木材。在史前时期，木器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木器在一般情况下易于腐烂，不易保存，而只有在某些地下水相当丰富的沼泽地带才能较好地保存下来。所以，长期以来，木器并未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

在我国较早发现木器是在六十年代初，在浙江的钱山漾¹ 和水田畈² 发现过一批。但是，由于当时发现的材料并不多，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河姆渡遗址的两次发掘³，才真正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只是集中注意干栏建筑而已。后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江苏常州圩墩⁴、吴江梅堰⁵、溧阳洋渚⁶、吴县澄湖古井⁷、浙江余杭反山⁸、瑶山⁹、宁波慈湖¹⁰、余杭庙前¹¹等遗址发现了一批木器。尽管已有一批遗址出土过不少木器，但是，目前尚未有人对这批木器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也正是促使我选作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第一，以前没有人专门系统地研究过史前木器，即使有，也只是就其中的几类器物进行过研究和探讨；这样，我没有多少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木器的定名、分类，前人并未有过较为统一的原则和方案。第二，由于木器材料并不十分丰富，有些器物的用途难以作出判断，这样，我只能对一些器物作初步的探讨，对另外一些器物则不作勉强的解释，只有留待以后再作进一步的探讨。第三，本文赖以讨论的材料，大多数还没有公开发表。河姆渡的两次简报只描述了少部分的木器，而圩墩、梅堰、慈湖、庙前等遗址出土的木器尚未见报告。这样，本文所用的材料，很多是作者在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进行观察、记录得来的。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中山大学的曾 骥、商志_序 常州市博物馆的陈 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 军、蒋乐平、王海明、浙江省博物馆的汪济英、卢 衡、宁波市博物馆的贺宇红、南京博物院的罗宗真、邹厚本、纪仲庆、苏州博物馆的丁金龙、台湾大学的黄士强等先生，他们或者慷慨热情地为我的参观考察提供各种便利，或者为我提供有关的资料，或

者给我提供各种宝贵意见。没有他们热情的支持和帮助，这篇文字是难以完成的。

二、江南地区史前时期自然环境概述

江南地区的地形以平原和低山丘陵为主。平原的主体部分为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江南部分，地势低平，呈以太湖为中心的浅蝶形，一般海拔2—5米，所以在全新世，本地区曾多次发生海侵；杭嘉湖平原地势稍高，海拔也不超过20米。本区西部为低山丘陵，包括宁镇山脉和莫干山地，海拔约250米左右。平原地区水网密布，土地肥沃，自古便是渔米之乡。丘陵地带森林茂密，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根据对遗址附近地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江南地区的遗址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背山面河的，它们多半后面有低矮的小山，前面有河流或者小湖泊。这一类可以包括河姆渡、慈湖、张陵山和崧泽等，如河姆渡，它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遗址西、南两面是平原，遗址正好位于由丘陵向平原的过渡地段。第二类遗址位于平原地区稍微隆起的土丘上，这类的有罗家角、圩墩等，如圩墩，位于江苏常州市郊，北临大运河，遗址所在地为一片高出周围农田的大型土墩，四周不见山丘。

研究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仅根据遗址周围的地形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研究史前地层里的孢子花粉的组合、动物群的成分，并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来研究当时的地形及气候条件。

地理学家根据孢子花粉的研究结果认为，杭嘉湖平原全新世的气候变化有如下趋势：距今7500—5000年，花粉组合为青岗栎—栲属—栎属—禾本科—藜本科—水龙骨科，反映出常绿阔叶、落叶阔叶混交林，指示湿热的气候；距今5000—2500年，花粉组合为栲属—松属—柏属—禾本科—藜属—藜科—水龙骨科，反映夹常绿阔叶林成分的落叶阔叶、针叶混交林植被，指示凉干的气候；距今2500年，花粉组合为栎属—青岗栎属—栲属—禾本科—藜属—水龙骨科，反映落叶阔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植被，指示暖湿的气候条件¹²。这说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杭嘉湖平原始终覆盖着阔叶林植被，为人类制造木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原材料。

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习性，这包括它要适应于一定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江南地区许多遗址都含有丰富的动物骨骼，花力气去研究它们，对研究古地理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各遗址动物骨骼的研究，我们发现江南地区许多遗址里出土有象和犀的骨骼，河姆渡第三、四层出土了苏门犀、爪哇犀、亚洲象的骨骼，邱城下层出土了亚洲象的牙齿，马桥下层也出土了亚洲象的骨骼，这说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一直有野象、野犀

分布。象和犀都是热带、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生活的动物。象体形极大，是现今陆生动物中最大的，适应温暖湿润、森林、草地及河湖沼泽的环境。另外，象的食量极大，据研究，每头象每天要吃草本、木本的嫩枝、嫩叶二三百斤；而且象还过着群居生活。犀的形体也较大，适应温暖、湿润、草地、河湖沼泽的环境¹³。上述种种现象使我们相信，在史前时期，江南地区总的来说是温暖湿润的，地面上森林茂密，水草丰富，很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植物资源。

太湖平原和杭嘉湖平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发现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等林栖动物，表明本地区史前时期曾经分布着很广的森林；同时，很多遗址还存在大量的牙獐、水牛、龟、鼋等生活在近水地区的动物，有的遗址还出土雁、鹤、鸬鹚、鹭等水鸟，罗家角等遗址还出土了扬子鳄残骸，反映出河湖密布的地形；草鱼、鲫鱼等鱼类的存在，则又反映了小水塘、水沟的存在。

至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自然环境作一总结：从地形上说，本地区以平原为主，兼有低矮丘陵，同时，周围广泛分布着各种河流湖泊；从植被上说，自始至终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地面上有丰富的灌木丛，水体附近有丰富的水生植物；从气候上说，以湿热的亚热带气候为主，只是到了良渚文化阶段，有变凉干的迹象，这时期出现了水井。¹⁴

良渚文化之前，气候温暖湿润，地下水非常丰富，为木器的保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江南地区遗址木器出土状况的一个特点：距地表越深（即年代越早的地层），木器保存得越好；同时也解释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木器不多见的现象。

三、史前木器的分类

(一)农业工具

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大多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含有农业经济的因素。就目前的发现而言，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农业生产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并已形成了以粟、黍为主要作物的华北传统和以稻为主要作物的华南传统。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和草鞋山遗址第十层，我们发现籼稻和粳稻共存，品种已经多样化了，表明距农业的开端已有相当的时间了，只是目前尚未发现更早的农业遗存。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大量使用木质农具，目前发现的有铲(耜)和耒等。

1. 铲(耜)

河姆渡T24(4):3 两侧和刃部薄，中间厚，后端有一近方形的柄部。长16，宽5.3，厚1.5cm(图一，1)。

河姆渡井1:7 第二层出土。平面近似方形，单面平刃，刃部较宽，背面中有一浅槽，两侧有两个长方形孔，后端柄部已残。残长36，宽16.5，厚1.5cm(图一，2)。

慈湖T202(下):11 梯形，一面微凹，凿有安柄用的竖向凹槽和捆扎绳索用的两个并排的方孔。中脊稍隆，长31，刃宽16.5，顶宽9，刃厚0.2，背厚2cm。

2.耒(点种棒) 数量较多，用较小的木棒削尖而成。

(1) 坊墩出土。用一树叉加工而成。利用树干的下部削成尖，并用火烧烤，表面炭化，使硬度明显增强；树叉口正好容一手掌，使用方便。长18.5，叉宽6.8，厚2.5-3cm(图一，3)。

(2) 坊墩四层出土 长57.6，直径1.9cm。取一带叉树干，下端加工成尖后用火烧烤。树干上留有小枝叉结节。(图一，4)。

(二)器柄

史前时期的大多数工具是安柄的，近几年在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出土了一批木质器柄，有锛柄、斧柄、锥柄、铲(耜)柄等。

1.锛柄 可分两式。

I式 曲尺形。

河姆渡T36(4):28 树叉加工制成，曲尺形，柄头长20.5，柄把长19cm(图一，5)。

慈湖T304(上):1 用树叉加工而成。一端粗短，外缘修直，开一缺口，以捆扎石锛。另一端细长，为把握之用。长26，高24cm。

II式 圆棒式。

洋渚出土。木柄较直，头部粗大，有卯口，出土时口内嵌有一长条形有段石锛；握手处较细。全长37，头部最粗径6cm(图一，6)。

2.斧柄 可分为两式。

I式 曲尺形。

河姆渡T231(4):135 利用树枝的分叉制成。长叉作柄，短叉粗大，其左侧末端加工成榫状，以利捆绑石斧。长叉残长19.5，短叉残长14cm(图一，7)。此种柄在河姆渡发现较多。

II式 圆棒式.

洋渚出土。木柄稍弯，头部粗大，有卯口，出土时口内嵌有一长条形石斧；握手处变细，作扁圆形。全长32，头部最粗径6cm(图一,8)。

吴县澄湖74WCHJ10：5 柄长76，柄径5—7cm。木柄粗端有方形孔槽，槽内有钻孔时留下的火灼痕迹。孔上小下大，将石斧插入孔内即可使用。出土时孔内有一件石斧(图一,9)。

3. 锥柄 坛墩出土。

(1)全长8.8，握手长4.6，径3.2cm。取一木棒切削而成，握手部分基本保持原状，不过有一较长的凹槽，另有两个小凹窝；下端紧挨握手处亦有一凹槽，以便捆扎骨锥。表面留有火烧痕迹(图一,10)。

(2)用一天然小木棒切削出一小段棒状突起，以捆扎骨锥，中下部留有火烧痕迹。(图一,11)。

4. 铲(耜)柄

河姆渡T232(4):91 平面呈T字形，系用同块木料制成，握手残宽2.4，残长38cm(图一,12)。

5. 其它器柄

(1)木雕鱼形器柄 河姆渡T231(4):303 呈T字形，系用同块木料制成。握手雕刻成鱼形，柄部阴刻弦纹和斜线纹相间图案。残长17.7，宽5.3，厚0.3cm(图一,13)。

(2)玉钺柄 在良渚文化大型墓葬中，常发现有玉钺，钺身上部的小孔上方有捆扎和磨擦的痕迹。同时这些玉钺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附带有钺冠饰和钺端饰，并且在墓中的安放方式也大体一样，钺身和钺冠饰在头端，钺端饰在手端。如反山”M14出土的玉钺，从钺端饰至钺冠饰全长70余厘米。左手部位为钺端饰，左肩上方为钺身和钺冠饰，已腐朽的木柄位置上有朱砂涂痕并错落镶嵌着96颗小玉粒。小玉粒一面平整，适于镶嵌或粘贴在木柄上；另一面弧凸并有光泽，应是朝外的。大的长7—8毫米，小的长3—4毫米，宽2毫米左右。¹⁵

(三)狩猎武器

尽管目前发现的遗址已具有较高水平的农业，但是它们毕竟还处于农业的早期阶段，光靠农业生产还不能维持生存；所以，各遗址都不同程度地含有渔猎成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各遗址含有大量的兽骨，其中大部分是人类捕获、食用后留下的遗骸；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各遗

址又都出土大量与渔猎有关的器物上，如各种型式的矛、鎒、鱼镖等等。在这些器物中，我们见到的多为石器和骨器，木器相对要少些，这应该是属于保存问题，而不能说明新石器时代不曾广泛使用木质狩猎武器。现在江南地区发现的木质武器有矛和鎒等。

1. 矛头

河姆渡出土的 12件均为硬木制成。器身修长，矛峰锐利，有的器身后段刻有凹口，可能是为了便于捆扎。

T17(4):17，后端两侧各有一凹口，长21.1，宽1.5cm(图二，1)。

T32(4):58，器形较厚，较宽，有明显的错磨痕迹，残长14cm。(图二,2)。

圩墩T8503(4):081一面刮削平整，一面略隆起，中间有一横向砍斫痕迹，尖部和削平的一端有火烤的痕迹。矛体很坚硬，长15.3，肩宽5.5，铤长3，厚1.8cm。(图二,3)。

2. 鎒

圩墩T8504(4):021用尖硬的木棒加工而成，尖不甚锋利，铤较短，长7.4，径2.0cm(图二,4)。

圩墩T8502(5):016用一细长树枝刮削而成。铤体呈细长圆锥状，铤呈细短圆锥状，长9cm(图二,5)。

3. 加工工具

加工工具是作用于其它物体的器物，它可以用来加工其它生产工具，也可以用来加工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用来加工食品，如加工谷物。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这类木器有锥、凿、刀、杵和榔头等。其中锥和凿可能是用来给加工对象穿(凿)孔的，榔头则可能是与凿配套使用的，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榔头上便有一明显的敲击窝(佯下)；木杵可能是与臼配合使用，以加工食物。遗憾的是，目前尚未发现杵臼共出的现象。

1. 锥 目前所发现的均为圩墩出土，用一坚硬的木棒加工而成。

(1) 锥体呈微弧形，尖端较细，底端稍宽，长9，中间径0.7，底端宽1.2cm(图二,6)。

(2) 尖端圆细，下部较宽扁，残长6，底宽1，厚0.2cm(图二,7)。

(3) 一面较平，背面有一道凸棱，横剖面呈三角形，中间偏上处有一树枝结节，近底端也有一个，长12.8，尖端宽0.4，中间宽0.8cm(图二,8)。

2. 长条形木凿 坊墩下层出土，长条形，宽刃，窄顶，单面刃，刮削平整，坚硬，长11.5，刃宽2.3，顶宽1，厚1cm(图二,9)。

3.木刀

- (1)圩墩出土。非常坚硬的薄木片，黑色，两头都呈圆尖状，且较锋利(图二,10)。
- (2)圩墩出土，扁平长条形，一面平整，背部略厚，刃较薄，一端成钝圆尖，另一端有短柄。长15.1，宽3..4，柄宽2.7cm(图二,11)。

4.木锤 慈湖T502(下):2 用树叉加工而成，长的一端作柄，短的一端加工成方头。柄长17.5cm。

5.木杵

河姆渡T233(4):115 断面略呈椭圆形，头粗大，当是加工谷物的工具。长92，头径8.3，柄径5cm(图二,12)。

6.木榔头

河姆渡T231(3):23 侧视呈烟斗状。弯柄，头粗大，一面有明显的敲击窝。长28.5、面宽8.4cm (图二,13)。

(2)水上交通工具

在第二节已经谈到，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在新石器时代也象今天一样，是一个河湖密布的水乡，同时也是鱼类繁衍的好地方。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人类的生活便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逐渐认识了水，于是有了发达的水上交通，有了“善舟楫”的传统；同时，人们为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还频繁地进行捕鱼的生产活动。因此，我们在这片地区内发现了大量桨(据统计不少于15件)，也发现了橹，唯不见舟，相信随着以后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应当会发现的。另外，当时人们也可能使用木筏或竹筏，江苏吴江梅堰龙南遗址古河道中发现不少树干，其中有的或许就与木筏有关。¹⁸

1.橹

圩墩四层出土 用一根粗大的树干加工而成，器形较厚重。橹叶部分略呈长方形，唯末端稍宽。把手部分亦略呈长方形，比叶部稍窄，中间有一凹状弯曲，较厚。柄叶之间有一突起，其两侧相向各挖一凹槽，当为将橹固定在木船上而设计的。全长 124，最宽处 18cm(图二,14)。

2.木桨

(1)慈湖T502(下):3 厚重硕大，柄、叶均呈方柱状，表面相当粗糙，当为半成品。长柄，尖头桨叶。全长193，厚3.5cm。

(2) 坊墩T8502(5) : 058 用同一根树干加工而成。器物轻巧，全长约70cm。桨柄细长，顶端略呈三角形，上有一三角形小孔。桨叶略呈柳叶状，唯末端较平。柄和叶的交接处有一较短的脊状突起。叶部稍残约1/3(图二,15)。

(3) 坊墩T8503(4) : 084 用质地坚的树干制成。加工甚为精细。桨柄细长，近叶处偏扁。桨叶较小而且很薄，下端较平。长87，柄径3，叶宽7，厚1.2cm(图二,16)。

(4) 河姆渡 T243(4) : 234 柄部与桨叶采用同一块木料制成，与现在使用的木桨形状相似，做工细致。残留的柄下端与桨叶的吻合处，阴刻有弦纹和斜线相同的图案。残长63，宽12.2，厚2.1cm(图二,17)。

(六) 纺织工具

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里，都发现过大量的纺轮等纺织工具，但是木质纺织工具则只在江南地区发现了一批，有纺轮、梭、匕、齿状梳纱器、卷布棍和经轴等，只是未发现织布机。

1. 纺轮

河姆渡T28(4) : 43，扁平圆形，中有一钻孔，直径5.9，厚0.9，孔径0.6cm(图二,18)。

2. 梭

(1) 坊墩T8502(4) : 056 长17.4，直径1.2cm。用一段小树枝刮削而成，呈细长条圆锥状，顶端穿一小孔(图二,19)。

(2) 河姆渡T17(4) : 61，一端有钻孔。此器原报告归入尖木棒一类，很可能是木梭，惜报告未作具体说明，也没有附线图。

3. 匕 4件，均河姆渡出土，其中刀形2件，长方形2件。这类木匕与杭州解放前手工织带用的木纬刀相似，推测它可能和当时的纺织有关。

(1) T17(4) : 17，硬木磨制，刀形，背部平直，较厚，另一侧弧形，较薄。长16.3，宽2.6cm(图二,20)。

(2) T1采集品 长方形，一端呈圆弧形，另一端平直，长15.5，宽3.3cm(图二,21)。

4. 齿状梳纱器

河姆渡T226(4) : 105 呈理发牙剪状，柄残。残长21.73，宽2.75，厚1.05cm(图5,6)。可能是用来梳整经纱的工具(图二,22)。

5. 卷布棍

河姆渡T231(4):204 小圆木棒两端削成四方形状，并在同一水平方向削有斜向缺口。长24.55，直径1.78cm(图二,23)。

6. 木经轴

河姆渡T222(4):153 作齿状，可能是固定经纱的工具。残长7，宽3，厚0.5cm(图二,25)。

(2) 日常生活用具

除了上述种类繁多的木器之外，还有一类很重要，而且种类、数量也较多的木器——日常生活用具。

1. 漆碗 河姆渡T231(4):30 木质，敛口，呈椭圆瓜棱状，有圈足。器壁外均有薄薄的一层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有光泽。口径10.9-9.2，高5.7，底径7.6-7.2cm。据有关方面鉴定，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钠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介光谱图相似”。¹⁷

2. 漆容器 坛墩四层出土。用一段较粗的原木剥削而成，胎质厚重，据残存部分看，完整器的直径在8cm左右。上下两端均有向内的迹象。外表涂漆。器物与筒或勺有关。残长13，外表弧线长8.7，胎厚1.2cm(图二,30)。

3. 嵌玉漆杯 在反山和瑶山遗址的墓葬里发现不少朱砂和红漆的痕迹，表明当时已随葬了漆器，但是，由于外部环境不适，器体多不能保存下来。瑶山”M9出土的是一件朱漆嵌玉高柄杯，器体作敞口圆筒形，下接细而弯的喇叭形圈足，形似现代的高柄酒杯。出土时胎体已朽，但通体内外壁原漆膜仍保持原状。推测原器厚约2毫米。漆膜呈朱红色，涂布均匀，出土时仍有光泽。在杯体与圈足的接合部及圈足近底处的外壁，分别镶嵌平面椭圆形、正面弧凸、背面平整的玉粒一周。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¹⁸(原报告中有一照片，比较模糊，没有线图)。

4. 木筒和木饼 河姆渡出土。形似一段中空的毛竹筒，系用整段木材加工制成，内外都错磨得十分光亮。有的内壁凿一周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壁缠绕蓖麻。器形精美。有的木筒外壁涂上淡黄色的漆。

(1) T17(4):23，长32.6，径9.4，壁厚0.7cm。器壁均匀，外壁近两端处缠有多道圈箍，金黄闪光，绚丽夺目(图二,26)。

(2) T36(4): 23, 长36cm, 内壁一端有一周凹槽, 塞有圆木饼, 出土时已压扁(图二, 27).
5. 勺 均墩T8502(5): 057 用一段较粗的树干挖成, 柄与勺不在同一平面上, 全长约

33, 勺体宽6.8, 勺窝深2, 长13cm, 勺的端部略残(图二, 28).

6. 木槽 钱山漾出土. 用一独木挖成, 长方形, 制作很精, 覆置作²顶状, 四壁倾斜(原报~~待~~附图).

7. 梳 水田畈出土. 用一长方形薄木块加工而成. 梳齿细密(图二, 29).

8. 笈 均墩出土, 用一坚硬的黑色木棒刮削而成.

(1) 略呈弧形, 一头较尖, 尖下有一结节, 另一端呈钝圆尖. 保存完整, 长10.8cm(图二, 31).

(2) 器身略呈弧形, 其中一侧还有一段稍向内凹. 一端较尖另一端钝圆. 长13.3cm(图二, 32).

(3) 加工不甚精致. 一端切平, 另一端削成弧形钝尖. 长11.8, 直径0.6cm(图二, 33).

9. 木屐 两件, 慈湖出土.

(1) T302(上): 1 梯形, 鞋面较平, 长24cm, 趾端呈弧形, 宽11.4cm, 跟端较平, 宽5.2cm. 穿5个圆孔, 鞋底相对的两孔之间有凹槽.

(2) T503(上): 1 长方形, 趾端呈斜尖状, 跟端呈弧形, 鞋面穿5个孔, 孔之间有凹槽. 两侧边缘向下凸起1cm, 形成两道凸棱, 以保护绳子. 鞋面长21.2, 宽8.6cm.

(4) 其它

1. 蝶形器 6件, 河姆渡出土. 正面中部都有一道纵向的突脊.

(1) T17(4): 37, 宽22.6, 高13.5cm, 左右对称, 正面两翼端各有一圆涡, 背面两翼上端各有一横向突脊, 脊上有钻孔(图二, 34).

(2) T17(4): 91, 宽23, 高13.4cm, 器形较简单, 两翼不对称, 一翼较长, 翼端呈鸟首形(图二, 35).

2. 蛭螺 各遗址都有发现, 数量也很多.

慈湖T502(下): 5 两头尖, 正中间有一深0.3, 宽0.7cm的凹槽, 并发现一段两股绳尚附在槽内. 高9.4, 中间直径10.6cm.

慈湖T201(下): 31 一端单尖, 一端双尖连体, 中部也有凹槽. 通高5.6cm.

3. 牛轭形器 两件 慈湖出土, 用木质较好的杂木树叉加而成, 形似牛轭形, 但远比牛

车轮小，轮尖有口，两翼上有可扎绳的凹槽，两翼中一翼稍长。

T201(下):30 两翼间距28cm; T302(下):5 翼残，翼距23cm.

4. 圆雕木鱼 河姆渡T231(4):309，周身阴刻大小不等的圆窝纹，形象颇为生动。长11，宽3.5，厚2.7cm(图二，36)。

5. 棺椁 在反山和瑶山遗址墓葬里，常发现大片板灰，有的板灰上还有朱红色涂层；在有的墓里还发现回字形填土结构。这些现象表明，这些墓已经使用棺椁之类的葬具。联系到这些墓中出土的大量玉琮等精美的玉器，我们可以认为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

四、其它地区的木器

1. 台湾地区

台湾是我国第一大岛，自从史前时期以来，台湾就同大陆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多数考古学家都认为台湾地区的史前文化受到过大陆较大的影响。¹⁹

在台北芝山岩遗址出土了一批木器²⁰，数量不多，但与江南地区的木器有其共同之处。这批木器有耒(图一，18、19)、矛头(图二，24)、木质装饰品(图二，37)、陀螺形器(图二，38)，还有几件可能是器柄或者桨的残片。耒的制法与江南地区的基本一致，用削、烧、磨等方法削出一尖，另一端无尖。陀螺形器则与河姆渡出土的垂球形器相似，而与圩墩、慈湖遗址出土的双尖陀螺形器不同。芝山岩的一件木装饰品颇具特色，“器形呈铃形，制作精细，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润。顶部两侧微突出，大概为了系绳。标本长4.3.3公分，底宽2.9公分，厚3公分。”²¹芝山岩的木器材料向我们表明，至少在距今3500年以前，即相当于江南崧泽文化时期，台湾先民就已经开始制造不同形式的木器了。这在一定程度是受到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影响的结果。

2. 华北地区

近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批丰富的木器²²。这批木器都出土于大中型墓中，出土时胎质多已腐朽，只在朽灰中大致能辨认出一部分器形，有案、俎、“几”、匣、盘、豆、斗、勺、瓢、杯、鼓、仓形器、耒、各种器柄等。这批木器总的来说，有如下特征：(1)从器类上说，日常生活用具占了绝大多数，这与江南地区日常生活用具所占

比例不大形成鲜明对照，这似乎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人类已普遍掌握了加工较复杂的器物的技术；在江南地区，目前所发现的木器的年代都较早，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目尚未见到木器方面的报道，良渚文化虽然有，但材料很少。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两地区的材料看到木器发展的一些线索。(2)这批木器的表面大多数都有彩绘花纹，既有单色红彩，也有以红彩为地，用黄、白、蓝、黑、绿等绘出花纹图案。所用原料大多为天然矿物，如朱砂、赤铁矿、孔雀石等，也有少数彩皮剥落时呈卷状，与漆皮相似，虽未做科学鉴定，但比照河姆渡和圩墩漆器的发现，当时使用漆器应该是可能的。(3)制作技术上除了掌握了早期的砍、凿、剜、刮削、打磨等基本技术之外，还发展了拼接、榫卯、装订的方法，其实这里有些技术在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建筑上已经使用了，只是“陶寺人”把他们运用在制作器物上，这不能不说是一次飞跃。(4)这批木器都出在大中型墓中，而且安放得有条不紊。“案必在棺前，瓢、杯、斗或折腹小陶_耳置案上；仓形器在头端左方，高柄豆在头端右方均奇数成组；盆形大木盘、勺、成组的豆放墓坑前部，盘、勺在棺右，木豆和陶豆亦奇数成组地放在棺左；炊厨用具木俎和陶_耳、陶灶在棺右侧后部，石刀与猪排、猪蹄在俎上，猪头骨在大型陶_耳内，鼉鼓成对放在左后端墓角，附近为特磬及陶异形器（土鼓？）”²³。

这些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不仅南方地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掌握了彩绘木器和漆器的制作技术，北方也不例外，我国悠久的漆器工艺传统在这时就已奠定了基础。第二，这些现象同反山和瑶山遗址的一些现象——大墓中不仅出土大量玉琮、玉璧、玉钺，而且还在这些器物的表面刻上“神徽”，同时还在玉钺的杖柄上涂上朱砂，镶嵌玉粒，另外还出土嵌玉漆器等——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青铜器尚未发展到普遍使用之前，彩绘木器和漆器同玉器等一样，已经成了身份标志之一——礼器的重要成分了。

五、有关新石器时代木器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木器的起源和发展

木器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广泛使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木器的起源当远在此之前。木器的远祖是木棒。起初人类可能利用未经有意加工的木棒，来追打猎物、敲落野果。然后，人类用拙笨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加工成长度适中，一端削尖的木棒，既可用来采集地下

的植物块根，又可刺杀地上的各种猎物。在非洲的坦噶尼湖南端的卡兰博瀑布附近，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单尖和双尖的木棒和短木锥；赞比亚和马拉维的草原林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纳库凡人使用大量刮削器，也表明当时木器及其副产品已经广泛使用²⁴。在英国的克拉克当和萨克郡的来灵根各发现一件旧石器时代的木矛头²⁵。在我国，虽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木器，但是，很多遗址都出土过刮削器，其中有的可能就是用来加工木器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木器的存在。

时代在前进，人类在进化，技术在发展，木器也在发展。木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器类的多样化，目前所见旧石器时代的木器只有三种器物（当然，由于木器不易保存，实际上原来可能不止），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已有近三十种；二是用途的专业化，在旧石器时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木器是“多功能”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如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已明显地可以分为农业工具、狩猎武器、交通工具、加工工具、纺织工具、日常用具等好几个大类了，甚至还出现了工艺美术品（如河姆渡的圈雕木鱼）。三是器形的复杂化，旧石器时代只见由木棒加工成的很简单的木器，到了新石器时代，各种形式的器物都出现了。复杂化的集中表现是容器和漆绘工艺的出现，如果说河姆渡、圩墩的涂漆容器还处于“初级阶段”，那么瑶山遗址的嵌玉漆器和陶寺遗址的彩绘木器则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并已成为“贵族阶层”的身份标志了。至此，木器已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了。

在这里，有一点是应该加以说明的。史前的物质文化是一个整体，各因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紧密相关的。木器的发展是以史前文化的整体水平相适应的。新石器时代木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磨制石器和骨器的普遍使用。

2. 木器在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中的地位

从上一节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在江南地区，木器的种类已经相当多，如果按用途分类，比较肯定的有七类，近三十种。这个数目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利用自身周围丰富的森林资源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可以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木器的广泛使用，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于人类来说，要生存，要发展，衣食住行是必须满足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它们又都与木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野生植物块根的采集、农作物的耕种来说，人们正是因为制造了耒、铲、锄等农业工